日常生活图景的再现与深描

——评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罗朝晖¹，王先明²

(1.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2.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当代史学界在对宏大叙事的反思和批判中，不断从具体而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重新建构历史的理论自觉，使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进程，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断地创新和拓展。^①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于200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作为一部“由新一代中国年轻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优秀代表作”，^②《街头文化》“在学术上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已为学界广泛关注，可谓近代中国城市史或社会史研究中的又一力作。

—

《街头文化》以成都为研究个案，时间跨度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即从太平天国后基层社会的重建到成都市政机构的正式建立。在近半个世纪历史中，成都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剧变，西方的入侵引起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重构，并导致了城市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作者从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揭示出充满各种诉求的利益阶层与地方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

全书分为8章，外加导论和结论，内容分三个部分：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和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时间上大致分为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新政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等四个时期，

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从“街头”和“街民”的二维角度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街头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展示着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舞台，

^① 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首先是从西方学者开始的，其中较富有影响的有墨菲的《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罗威廉的《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和《汉口：1796——1895年的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魏斐德的《1927——1937年的上海警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清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等。国内学者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等。特别是张仲礼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隗瀛涛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皮明麻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罗澍伟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郝良真、孙继民的《邯郸近代城市史》（测绘出版社，1992）等研究成果，作为个案研究，在国内城市史研究中具有拓荒性质。

^②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语，China Quarterly, 180（2004），第1113页。

深深地浸润着独特的文化气息。作者研究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节日庆典空间，并选取了在这种公共空间中生活的下层民众：商贩、苦力、游民、妇女等，细致详尽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娱乐、邻里关系及社会组织。通过考察，作者试图证明 19 世纪后期在成都这个内陆城市中，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而官方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也很少直接干涉。特别是对“街民”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的关注，旨在提出下层民众比其他阶层更多地利用公共空间，并创造了表达地方传统的街头文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对茶馆的深入研究，将茶馆视为一个社会的缩影进行考察，揭示出在追求闲逸的表面现象之下，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①

第二部分围绕着公共空间的政治角力、经济关系和文化生态的课题展开，核心论题是 20 世纪新政时期，由国家发起和精英支持的社会改良运动，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景观，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成都公共空间、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在 20 世纪初的现代化进程之始，国家力图在地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基础，其中新学校、新警察、新政府机构等成为最突出的标志。社会改良者迫切地对下层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他们将大众宗教和大众娱乐视为民众愚昧落后的表现，予以改造和打击，并试图借助国家机器重建公共空间，却遭遇了下层民众“弱者的反抗”。作者认为，在社会改良运动之中，街头文化不仅是民众自我认同的一种基础，而且也是他们抵抗精英文化入侵，并且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武器。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政府控制与大众需求之间充满了矛盾与对峙。

第三部分探讨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下层民众、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复杂的街头角力，各种利益集团捭阖纵横，运作权力，展开了对街头这一公共空间的争夺。在社会与政治的巨大变动中，地方精英运用国家权力的象征性资源不断地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国家权力也巧妙地借助地方精英的影响力来推动政策的实施。于是在晚清新政时期，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结盟，共同对付下层民众，但当国家权力危及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利益时，地方精英又联合民众以对抗国家权力。换言之，地方精英作为国家和下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在二者之间摇摆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此时，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前所未有地与地方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对这一复杂过程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关于国家建构中，国家、精英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在具体社会权力结构下的展开。同时，作者在阐明仪式象征意义及内在逻辑的同时，更为关注仪式在社会变革中的存在和运用，关注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②。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从一个较广的历史视野，估价了成都的街头文化、公共空间和下层民众的演变及其意义：成都街头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体现了社会和政治深化的一般趋势。作者将街头文化延展开来，呈现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图景，有助于我们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大众文化、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以及地方政治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

二

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费弗尔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事实上，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新问题的提出，不仅决定了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决定了研究视域的突破与创新。王笛的《街头文化》无疑是这种实践的优秀成果。

在本书中，作者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

^① 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王笛的英文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撰写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二卷（1950—2000 年）。

^② 见本书第七章中“革命仪式与街头政治”。

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中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的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

^①可见，公共空间成为作者深入研究的基点，即作者努力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探索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张信在其书评中指出，《成都街头文化》一书的出版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是对前几年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公共领域”之讨论的突破。^②对公共领域的概念阐释与理论分析富有原创性贡献的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1962年出版的这部书中，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一词概念化。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即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③可见，公共领域最基本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应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分区域、分阶层来探讨中国近世历史。^④在“中国中心观”的理论背景下，西方学者尝试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构建解读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认知模式，并引起了学者们对公共领域展开激烈的讨论。^⑤以罗威廉、兰金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后认为，自明以来，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包含国家和社会两方面力量的公共领域。但罗威廉也坦言：我们之所以斗胆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基于我们对事件和制度的研究，而且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中国政治语汇中确实包涵着一个术语，即“公”(gong)，其涵义与它的西方对应词“公共”(Public)的含义十分相似，同样存有诸多不明确之处，而且在此话语的共同体中也易于引起相似的争论。^⑥以孔复礼、魏斐德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世并不曾出现足以与国家形成对抗的自治空间。而黄宗智则认为哈贝马斯本人的概念不是太特定就是太宽泛，难于真正适合中国。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概念的历史特定性太强，无法用以指导对中国的分析。因此他主张“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⑦

在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争论中，师从罗威廉的王笛首先从区域范围内探讨晚清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论证“在晚清的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已初步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

^①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② 张信：王笛著《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32页。

^④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⑤ 参见余新中：《中国的民间力量与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4期。

^⑥ 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⑦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20页。

定了基础，尽管这个基础的规模和深度都是很有有限的。”^①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细节并不适宜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便严格限制在“处于‘私’与‘官’之间的公共事业”，而不是研究西方概念中的“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在《街头文化》中得到了重申，作者在自序中清楚地表明，本书没有讨论“公共领域”，因为这并不是本书的出发点。而研究的重点是“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②公共空间成为作者展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深刻剖析，提示出国家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要解决“物质”的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因此，本书不是直接讨论“公共领域”，但却为“公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入细致的个案思考。

王笛对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关系的研究，再一次为我们提供启示：运用从西方经验中引伸出来的分析范畴去检视中国的历史，其重要性在于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借鉴和使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社会时，如果转而选择适用一些限定性更强的中层判断，将是建构对中国历史之研究的一个潜在的有效途径。当然，这一判断的选择，应该是对所研究问题的更深层面的思考，而非简单的回避与绕行。

三

《街头文化》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具有独特鲜明的特点。

首先，本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作者在解读史料中，形成了自己出人意料的不同视角。以往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大多将着眼点放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如上海、武汉等地，并且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地方精英，与作者10年前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③不同的是，《街头文化》“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④

独特的问题意识延展开来，形成作者独特的研究视域。“街头文化”（Street Culture）作为王笛首创的概念，体现了作者贴近社会底层的心态和毅力。通过对城市街头的研究，使我们进入到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从而对这一城市进行系统的考察。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作者将“街头”视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历史变数的场域，并不满足于单向和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研究各个阶层交错复杂的联合与斗争。

在作者笔下，有精英们对普通民众行为和思想的批判与改造，有改良者试图通过新的大众娱乐对下层民众生活习惯的改革，有地方政治力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有社会控制力量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入与影响，当然下层民众对公共空间的争夺斗争在此期间也从未停止过。作者详尽论述精英对街头文化从敌视到改造，以及与民众从对立到合作又分离的复杂过程，揭示出不同社会层面呈现出的复杂性，形象地展现了吉登斯所提出的引发阶级冲突的“具体情境的接触”。^⑤

例如，作者在关注下层民众中特殊的群体——妓女时，引用了当时《国民公报》的一则报道：一娼妓头梳大毛辫，戴绿泥遮阳帽、金丝眼镜。穿披青缎中式时样皮袄、扎脚青裤，批（扎）西式白色洋头绳。（穿）大披肩、电光褂、花绿色风毛新式朝元鞋。全身妆饰，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两手叉腰，沿街笑骂。^⑥在精英们的眼中对她们充满了敌视与谴责，而作者却从中读出：所谓“奇妆（装）异服”、“沿街笑骂”，无视路人侧目，可以说是她们对

^① 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③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2001年再版。

^④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⑤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第306页。

^⑥ 见本书第六章中妓女：挣扎与“新生”

鄙视她们的社会反抗的一种方式。作为经常受到限制的社会底层，妓女用她们有限的能量和资源作为工具，来宣称她们对公共空间的权利。还有作者对成都的轿夫“通过炫耀他们的技能来获取快乐”的行为做了这样分析：其实，像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样，“他们的劳动就像是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从而“产生了街头政治”。成都的轿夫用他们的行为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间接地抗议他们受到的压迫。^①可见，自觉地去重新建构民众的历史成为作者的研究视角。

贯穿本书的正是这样的“下层民众”的眼光：作者的注意力主要在那些社会下层，他们可以是“无名者”、“任何人”、“一般人”，或者是“依附阶级”，或用统治的话讲是“危险的阶级”。在作者看来，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早已被忘却，但他们的确曾经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②可见，《街头文化》体现了作者治学的微观史学和下层史观。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对于成都街头的研究，使我们能把视线集中在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领域，犹如在显微镜下把观察的对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某一方面，从而得到宏观史学难以企及的对社会的细微理解和精确把握。”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凡的学术功力。

对资料独特的解读方式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深描”理论认为，人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微小事件也渗透了整个社会的意义系统，通过对于这个事件的解码，就能够达到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系统及支配这一编码过程的权力结构的理解。《街头文化》便是一次深入细致的“解码”实践。通过对资料的解读，作者接近了下层民众“微弱的声音”和模糊的身影，知微见著，作者在深层次上为我们展示的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在史料搜集的艰辛与详尽上，作者无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重现消逝了的街头文化，作者发掘了大量资料，主要有“官方文本、大众传媒、调查统计以及私人记录”，其中包括档案、游记、日记、报刊，甚至是文学的资料，如地方谚语、民间文学、地方戏曲和诗词。同时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散落在地方志、地方文人作品以及当时流行媒介里的错杂的“史料”，而这些材料基本上带有官方的眼光，又很可能受到精英话语的歪曲，所以作者不断地反思：我们所看到的‘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吗？它是否是精英所扭曲了的所谓大众文化？历史的本身就是如此吗？还是透过我们的眼睛和思考所呈现出来的呢？在对资料的解读中，作者避免“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懒汉”式的研究方法，力图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仔细分析每一条资料的来源和实际意义，以期从模糊的文字中读出一些独特的、深层的和意想不到的信息。

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已经介入了寻求大众的文化和大众的历史的书写方式的努力，这一努力无疑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作者因此具有对各种资料很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足以辨识“精英意识”的遮蔽，而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一种实践只有从它在生活语境和根植的传统中的立场那里才可以理解，才可以得到判断。”^③作者正是在街头“物质空间”中的文化元素里，用材料的碎片再现出那个消逝的或是正在消失的历史图景，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地方宗教、民间风俗、节日庆典、社会组织以及它们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的一个新角度，而且揭示出更广阔的和更深刻的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

第三，本书具有可读性的召唤性质。

^① 见本书第六章中穷人：城市社会的底层。

^② 见本书第一章：导论。

^③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细节化的书写无疑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事实上，本书的精彩之处正在于细节之中，惟有能欣赏这些细节的人才能读得津津有味。作者极其熟练地运用“叙事”的表达方式，力图“把读者引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①

堪称晚清成都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的八卷本《成都通览》，包括 850 个民间故事、759 首民歌民谣的《成都民间文学集成》，汇集成都街头众生相的清末民初的《通俗画报》，李劫人、巴金的长篇小说，中外学者和旅行者的日记和回忆录等都成为作者让“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的写作材料。

贴近民众的自觉，细致入微的观察，凝练流畅的语言，得心应手的叙述，使已经尘封的历史在作者笔下鲜活起来：集市上小贩的叫卖，茶馆里茶客的休闲，街头上轿夫的表演，路口旁艺人的杂耍，祭坛中信徒的跪拜，商业场妓女的招摇……无一不在勾画着鲜明的大众文化图景，展示出成都独特的文化气质。

本书还大量引用成都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的竹枝词更是以吟咏风土为其特色，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为本书增色不少。“饥寒两逼困江滨，未死犹如已死身”的乞丐，“镶鞋净袜一双双，游遍罗城又粉江”的妓女，“人物衣冠俱不类，还多一副狠心肠”的屠夫，“一日唱来闲半日，青蚨一串尚嫌廉”的说书人，“不辞典卖金钗钏，鸦片烟迷女眷心”的成瘾妇女等，仿佛从历史的深处显现出来，游走在读者的视线中。

本书中还配有 100 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与文字的记载相映成趣。其中有西方传教士、旅行者和记者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这些视觉资料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看到那熙熙攘攘的街头和芸芸众生的相貌，为我们描画出一幅清末民初成都的历史图景，从另一个角度重构和再现了那逝去的文化和历史。

四

在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变动与传承从来也没有淡出学者的研究视野，而是不断地加以强化。《街头文化》探讨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复杂的关系，通过历史叙事重构出消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尽管研究是微观的，但背后的关怀却是宏观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诚如作者所言，“虽然本书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但我却有着现实的关怀。”^②作者试图对过去城市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积极结果是不容否认的，在诸多目光焦距在近代改良、革命等那些显示“进步”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作者追问的是：我们在文化上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般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在社会的剧变中到底得到了多大的利益？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在这个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语境中，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在强调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传统和文化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它内部所存在的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那些消极因素。因此，怎样看待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继承与扬弃这些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系列矛盾仍然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此外，关于本书中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也有商讨的余地。如对“精英”概念的使用，作者的观点是“我经常使用‘精英’或‘地方精英’作为民众的对应力量，在本书中‘精英’或‘地方精英’概念的使用十分松散，按照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冉枚烁（Mary Rankin）的定义，他们可以是‘任何在地方社会起主导地位的个人或家庭’。他们不一定是富人，不一定是有权者，不一定是现代化或西化者，但他们试图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或思想方

^①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②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面对一般民众施加影响”。^①这种定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很明显是不足以体现“精英”的本质的。“精英确切所指的是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因此，“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不是对社会体系中某一阶层或阶级定位的精确指称，而是基于社会控制体系中对社会成员地位的一个模糊性描述。”^②因语境的差异，在使用概念时有所取舍，似不必苛求，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概念原则的严谨性与操作上灵活性的分离。

同时本书在揭示民众社会心理方面也有待深入，尽管作者关注着下层民众的生活在社会演进中变化，特别是混乱时期下层民众经历的巨大心理压力，^③但对民众的心理积淀和表现还可进行更为深刻的挖掘和剖析。心态史的研究追求的是长时段的意义，要求“同情理解”，要求人文主义取向，这样会有助于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

《街头文化》出版不久，西方史学界已是好评如潮。美国的《中国政治学刊》评价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本书都将是研究中国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英国的《中国季刊》则赞誉这是一部中国新一代年轻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优秀代表之作。^④毋庸置疑，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汰洗的优秀成果。

一个城市绾接了一段历史记忆，一段历史复活了一种精神失忆，细细读来，《街头文化》的意义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6-12-21

作者简介：罗朝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先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本书第一章“导言”。

^② 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见本书第七章“政治”。

^④ 《The China Quarterly》，Dec.1,2004.